

南朝宋郑缉之《永嘉记》考述*

鲍远航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摘要：郑缉之《永嘉记》，是较早的古代地记作品。本文经考证提出：《永嘉记》的作者郑缉之熟悉浙江地理，或有过任职于永嘉（今温州）、东阳（今金华）二郡的经历。其所作《永嘉记》在北宋前期犹存于世，南宋时亡佚。虽原书久佚，但其佚文仍具有重要的经济文献价值和文化价值。本文还对《永嘉记》现有辑本的佚文归属，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永嘉记》；亡佚时代；佚文；价值

中图分类号：I2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105（2011）03-0082-05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Zheng Jizhi 's Yong Jia Ji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Song

BAO Yuan-hang

(Arts College of Huzhou Normal University,Huzhou,Zhejiang,313000)

Abstract: Zheng Jizhi's Yong Jia Ji, is the ancient remember earlier works. After textual criticism, the paper presents that: Zheng Jizhi, the author of Yong Jia Ji acquainted with Zhjiang geography, or had served in Yongjia (current Wenzhou), and Dongyang (now Jinhua). His works, Yong Jia Ji still exists in the world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but lost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lthough the original book has been lost, the lost articles are still has a significant economic value and cultural values. This article also puts forward some views for the current Yong Jia Ji.

Key words: the Yong Jia Ji; dead lost time; lost articles; value

汉魏以来，地记撰述渐多，而尤以晋宋为盛。唐刘知几《史通》谓：“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1]晋宋地记内容广泛，记述山川物产，描写宫殿台阁，叙述乡国灵怪，记录人物故事，采引歌谣谚语，可视之为“地方的百科全书”。这些地记在体例和内容上都和南宋以后发展为定型的方志非常接近，是后世方志发端的重要源头。

郑缉之《永嘉记》就是这类地记作品之一的代表。晋宋永嘉郡，治永宁县，即今浙江温州。《永嘉记》就是一部记载温州在晋宋时代的乡土地理、山川、物产、风俗、文化等内容的著作，是温州的

第一部方志。

但由于历时久远，《永嘉记》早已亡佚，其内容只散见于类书、杂史、前人注释等文献著作中。零圭断璧，弥足珍贵。作为《永嘉记》这样对于温州历史文化研究非常重要的文献，学界目前还没有文章对它作出深入细致的探究。因此，拙文拟对《永嘉记》作出较为详细的考察，庶几有助于学者们的相关研究。

一、《永嘉记》亡佚时代考

郑缉之《永嘉记》，诸书征引又或作《永嘉郡记》、《永嘉地记》，不见于正史著录。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五十三最早著录此书。雍正《浙江通志》修于雍正七年（1729）至雍正十三年（1735）之

收稿日期：2011-5-3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水经注》与晋宋地理文学文献研究”（10YJA751005）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鲍远航(1967-)，男，河北承德人，浙江湖州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与文献学研究。

间，其编纂者未必能目验《永嘉记》，因为至清时，晋宋地记亡佚殆尽，包括见诸正史著录的许多地记，如郑缉之《东阳记》等，都未能留存，不见于史书著录者，更无留存可能。《浙江通志》的编修者，或见历代类书等著作征引，才将其著录。此后，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王谟《汉唐地理书钞·总目》并皆著录有郑缉之《永嘉记》。

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注、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较早征引《永嘉记》。《世说新语·轻诋第二十六》“王兴道谓谢望蔡霍霍如失鹰师”注、《齐民要术》卷二《种瓜茄子附》及卷五《种桑、柘养蚕附》和《种竹》均引《永嘉记》。可见，《永嘉记》至少在齐、梁时期就颇有影响，引起了很多学者和文人的注意，以至流传到了北地。

唐宋类书等著作，征引《永嘉记》者不少。如唐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司马贞《史记索隐》、段公路《北户录》、《白孔六帖》、宋李昉《太平御览》、乐史《太平寰宇记》等，都引有郑缉之《永嘉记》。其中《太平御览》征引最多，达到三十余条。这说明，到唐宋类书编纂流行时，《永嘉记》成了一种重要的文献来源。由《太平御览》征引最多，且条目大多不见于前修类书，可以推知，郑缉之《永嘉记》至少在北宋犹存于世。但北宋以后类书、方志征引《永嘉记》，皆不出唐代及北宋类书等所引之外，可见已经亡佚。

可以推断：《东阳记》南宋时期已经亡佚。

郑缉之《永嘉记》亡佚已久，按《中国古佚书辑本目录》，今有宛委山堂《说郛》辑本、清黄奭辑本及孙诒让辑本。^[2]又有今人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辑有郑缉之《永嘉记》，收录郑《记》四十四条。比较诸辑本，当以瑞安孙诒让所辑最为详备，凡有辑佚文五十一条。

二、《永嘉记》作者考证

《永嘉记》作者郑缉之，生平无史传记载。但《旧唐书·经籍志上》及《新唐书·艺文志二》著录有郑缉之《东阳记》。可知郑缉之除了《永嘉记》外，

另著有《东阳记》。晋宋东阳郡，治长山县，即今浙江金华。

由上，郑缉之为永嘉、东阳二郡作记，或由游宦所至，抑或其人著籍在兹，难以臆定。考虑到刘宋时期，缙云山就在东阳、永嘉的交界处，即在永康县南，栝苍县北，那么，郑缉之或居于缙云山附近。但清末胡宗懋认为郑缉之并非金华人，其《金华经籍志》谓：“作者非郡人而撰述有关吾郡掌故，如郑缉之《东阳记》类。”^[3]可见，胡认为郑缉之“非郡人”，但不知其所据者何。

《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孝子传》十卷，宋员外郎郑缉之撰。^[4]

《旧唐书·经籍志上》：“《孝子传赞》十卷，郑缉之撰。^[5]

《新唐书·艺文志二》：“郑缉之《孝子传赞》十卷。^[6]

从以上史籍著录可知，郑缉之是南朝宋时人，官为员外郎，郑缉之除了撰有《东阳记》外，另撰有《孝子传》十卷^①。

缉之所任员外郎一职，可按六朝官制考知。员外郎，即员外散骑侍郎。《晋书·职官志》：“员外散骑侍郎，武帝置，无员。”^[7]唐杜佑《通典》卷二二《职官四》：“尚书员外郎”条下，杜氏云：

前代史传及职官要录或有言员外郎者，盖谓员外散骑侍郎耳。^[8]

员外郎与正员郎是有所不同的，所谓正员是指编制之内的，而员外则是编制之外的，是一种“正额之外”增设的官职。^②这样，郑缉之所任官“员外郎”或许并非职事官。若郑缉之不是本地人，则其必定有过任职于东阳、永嘉二郡的经历，所以他才会对二郡的风土民情、地理物产诸事特别明悉，而且非常有兴趣，所以才要将它们形诸文字，留存后世。

三、《永嘉记》佚文考辨

《永嘉记》，诸书作者皆作郑缉之，惟有《太平寰宇记》有二条引《永嘉记》，作者题谢灵运。故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将此二条属之于谢灵运名下。一条是《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一《浦城县》引^[9]：

(浦城县)有二浦,一曰柘浦,水源出于建安吴兴县,俗称越王城,以其城临浦,故曰浦城。

孙诒让说:“谢太守灵运《永嘉记》,隋唐以来史志书目,并未著录。《太平寰宇记》所引,与《白孔六帖》六引《永嘉郡记》柘浦水出建安吴兴县文同,或即郑《记》,乐史误题谢名。”^[10]此说似乎可信。因为,《太平御览》凡引郑编之《永嘉记》,皆作“《永嘉郡记》”而不作“《永嘉记》”。

但是,笔者检看《白孔六帖》卷六《水十一》:合瀛:《山海经》曰:剡山有兽焉,名合瀛,见天下大水,其上有水焉,湛而清,帝台之浆水也。

柘林:水出建安吴兴县。

梧桐:水有两源,其山松杨。

桃枝:水出东阳长山县桃林之下,见《永嘉郡记》。

湘水:《湘中记》曰,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了然,其石子如樗蒲大,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如朝露。

按:从上列《白孔六帖》原文可以看出,《白孔六帖》在每条水后都有注释,有的征引了前代著述,都说明了其出处。但《六帖》只在桃枝水后标明是出自《永嘉郡记》。而“柘林”与“梧桐”两水注释,并未指出有所征引。孙诒让或连读而下,误以为三水皆出自《永嘉郡记》。

尽管孙诒让有所误读,但也不能就此断言谢灵运也曾作过《永嘉记》。

第一,隋唐以来史志书目,并未著录谢灵运《永嘉记》。以谢灵运的地位和声望来看,著作遗漏不被著录的情况比较少有。

第二,隋唐以来类书甚夥,何以只征引郑氏《永嘉记》而弃谢氏《永嘉记》不引?

看来也存在“乐史误题”的可能。但是,乐史何以“误题”呢?我们再来考察《太平寰宇记》卷九九《丽水县》^[11]所引谢《记》一条:

凡此诸山多龙须草,以为攀龙而坠,化为此草。又有孤石,从地特起,高三百丈。以临水,绵连数千峰,或如莲花,或似羊角之状。

今检《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四《百卉部一·龙须》引谢灵运《游名山志》曰:“龙须草,惟东阳、永嘉有。永嘉有缙云堂,意者谓鼎湖攀龙须时,有坠落化而为草,故有龙须之称。”^[12]

又元人陈性定《仙都志·山川》^③“独峰山”条下引:“谢灵运《名山记》云:缙云山旁有孤石,屹然干云,高二百丈,三面临水。周围一百六十丈;顶有湖,生莲花,有岩相近名步虚,近而视之步虚居其下。中岩上有峰高数十丈,或如莲花或如羊角。古老云:黄帝炼丹于此。”

按,《名山记》系谢灵运《游名山志》,同作异名耳,今亦早已亡佚。《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三“地理类”在谢灵运名下有《居名山志》一卷,《游名山志》一卷。宋代高似孙《剡录》则简称为《游山志》和《山居志》。但今人赵树功《谢灵运〈游名山志〉辨名及佚文》已作了详实的考证:“所谓《名山志》既不是谢灵运另外有别于《游名山志》的专门作品,也不是《居名山志》,而是《游名山志》的简称。”^[13]

把《太平御览》所引谢灵运《游名山志》和《仙都志》所引谢灵运《名山记》两段文字合在一起,与上引《太平寰宇记·丽水县》所引《永嘉记》进行比照,容易看出,内容大致相同。则《寰宇记》此条征引,应该出于谢灵运《名山记》。可见,乐史或许误将谢灵运《名山记》题作《永嘉记》。

宋代的《册府元龟》卷五百六十:“谢灵运为御史中丞,免官,东还永嘉,撰《游名山志》一卷,《居名山志》一卷。”可见《游名山志》和《居名山志》是谢灵运永嘉之作。由于谢灵运在永嘉作有《名山记》即《游名山志》,乐史引录则曰:“谢灵运永嘉《记》”,其意指谢灵运在永嘉写的《名山记》,而非“谢灵运《永嘉记》”。抑或今人标点断句不同,以致产生岐义?

因此,《太平寰宇记》“浦城县”、“丽水县”所征引两条,若非乐史误题《名山记》作《永嘉记》,则或是今人未能领会乐史本意。《寰宇记》所引这两条有可能都出自谢灵运《名山记》。

这样看来，孙诒让把谢《记》各条归到郑氏《郡记》名下，似有不妥。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仅以《寰宇记》二条孤证，即以为谢灵运也作有《永嘉记》，也嫌根据不足。

又《白孔六帖》卷六《水十一》：“桃枝水出东阳长山县桃林之下，见《永嘉郡记》。”由于刘纬毅未检《白孔六帖》，此条《汉唐方志辑佚》失辑。

四、《永嘉记》佚文价值论析

郑缉之《永嘉记》已亡佚千年，现今已无法知其原貌。但我们仍可就现已辑存的一些条目，以窥管中之豹。

如果把《永嘉记》佚文和同时代的其他地记如山谦之的《吴兴记》、孔灵符的《会稽记》、刘道真的《钱塘记》等进行比较，很容易看出《永嘉记》佚文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永嘉记》尤以记述物产为详。

即使同出自于郑缉之的《东阳记》，在内容文笔上也与《永嘉记》有很大不同。如《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二《竹部一·竹上》引《东阳记》：

昆山去莞城山十里，峰岭高峻。故老传云：岭上有圆池，鱼鳖具有。池边有竹，极大。风至垂屈，扫地恒洁，如人扫之。^[14]

此段描写，先总写昆山“峰岭高峻”，再把镜头拉近，写岭上圆池，再用特写镜头突出描写池边之竹，极有层次，具有蒙太奇般的表现效果。“故老传云”，增添了几分神秘；“风至垂屈，扫地恒洁，如人扫之”的细节刻画，更让人产生如身临其境一般的感觉。

再看《齐民要术》卷五《种竹》引《永嘉记》^[15]：

含隋竹笋，六月生，迄九月，味与箭竹笋相似。凡诸竹笋，十一月掘土取皆得，长八九寸。长泽民家，尽养黄苦竹。永宁、南汉，更年上笋，大者一围五六寸。明年应上今年十一月笋，土中已生，但未出，须掘土取；可至明年正月出土讫。五月方过，六月便有含隋笋。含隋笋迄七月、八月，九月已有箭竹笋，迄后年四月。竟年常有，笋不绝也。

《永嘉记》此条，介绍的则是种竹的时间和方法，告诉人们怎样种竹，才能使笋“竟年常有”。

同是写竹，《永嘉记》与上引《东阳记》迥异其趣。比较而言，《永嘉记》多写物产经济，注重实用性；《东阳记》描写形象生动，更富有文学意味。

《永嘉记》所记录物产，品类众多：水产则香螺、文蛤、蛎、蟹、鮀鱼等，药材则黄精、细辛、恒山、黄檗、黄连、茵芝等，矿产则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砚等，甚是丰富。

最值得注意的是郑缉之《永嘉郡记》，较早详细记载了南方养蚕、养蜂诸事。《齐民要术》卷五《种桑、柘养蚕附》引《永嘉记》^[16]：

永嘉有八辈蚕：……取蠣珍之卵，藏内罌中，随器大小，亦可十纸盖覆器中，安硎泉、冷水中，使冷气折其出势。……藏卵时，勿令见人。应用二七赤豆，安器底，腊月桑柴二七枚，以麻卵纸，当令水高下，与重卵相齐。若外水高，则卵死不复出；若外水下，卵则冷气少，不能折其出势。

可见当时温州地区，已经能利用冷水低温控制蚕卵孵化时间，从而达到按季节分批在一年内饲育多批蚕。这说明，晋宋时期养蚕技术已经有了重大进展，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对蚕的生物学特性的认识越来越具有科学性。

《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虫豸部七·蜂》引《永嘉郡记》：

七八月中，常有蜜蜂群过，有一蜂先飞，觅止泊处。人知辄内木桶中，以蜜涂桶中。飞者闻蜜气或停，不过三四来，便举群悉至。^[17]

此条记述了晋宋时期，浙江温州平原已经懂得用蜜涂桶来引诱蜂群的方法，说明了当时半野生的蜜蜂已逐渐向家蜂过渡。这也是我国蜜蜂养殖史上的珍贵资料。

郑缉之《永嘉记》还记载了热带地区的经济作物甘蔗已开始传入浙江沿海地区。《太平御览》卷九百七十四《果部十一·甘蔗》引《永嘉郡记》：

乐城县三州府，江有三洲，因以为名。对岸有浦，名为菰子，出好甘蔗。^[18]

《永嘉记》还记载了北方的梨树，此时已引进在浙南山区种植。《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九《果部

六·梨》引《永嘉记》：

青田村民家多种梨树，名曰官梨。子大一围五寸。树老，今不复结子。此中梨子佳，甘美少比，实大出一围，恒以供献，名为涌瑞。吏司守视，土人有未知味者。梨实落至地，即融释。^[19]

此段文字还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青田村”这个具体的村名。晋宋以前，县级以下的村落名称，一山一水的小地名，往往为史书所不载。今人章义和做过统计：“《晋书》中所见‘村’凡十一处，无一例外地皆为泛称。同期的地方志和志怪小说中，却出现了具体的村名。如……郑缉之《永嘉郡记》所见‘青田村’、袁山松《宜都山川记》所见‘射堂村’……等等。正史中出现具体村名的是《宋书》，凡四十二见中共有十四个具体的村名。”^[20]章义和所注意到的这个情况，正好证明了郑缉之《永嘉记》等晋宋地记对于小地名的记录，影响到了《宋书》以后正史在这个方面细小的变化。同时也说明《宋书》的

撰著，必以晋宋地记作为重要的取材渊薮。

《宋书》卷一一《志序》云：“地理参差，事难该辨，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充，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21]由于战争纷扰，政权交替频繁，晋宋时期，官府不能像汉朝那样由朝廷有组织地修定历史地理书籍。这样，如郑缉之《永嘉记》等出自于私人手笔的乡土地记就在这方面起到了替代作用，为后来的修史者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材料参考。

综上可见，郑缉之《永嘉记》在经济、地理、历史、文化等很多方面，都给后世提供了可资采掇的素材、可资借鉴的经验。尤其《永嘉记》有关物产经济方面的记述，对我们了解温州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作为早期的乡土地理文学文献，郑缉之《永嘉记》自有其不菲的价值和贡献。

注释：

- ① 郑缉之《孝子传》早已亡佚，今有茆泮林、王仁俊等辑本，见《古佚书辑本目录》。
- ② 参周一良《从〈礼仪志〉考察官制》，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
- ③ 陈性定《仙都志》，元至正八年（1348）年编著，有铁琴铜剑楼钞本，北京图书馆藏。

参考文献：

- [1] (唐)刘知已.史通·内篇·杂述第三十四[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82.
- [2] 孙启治,陈建华.中国古佚书辑本目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191.
- [3] (清)胡宗懋.金华经籍志·卷首·例言[M].中国书店(影印本), 1991.
- [4] (唐)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5:976.
- [5] (五代)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5:2002.
- [6] (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5:1480.
- [7] (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4.
- [8]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 [9] [11] (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四库全书影印本.第四六九册:史部地理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0] 洪煥春.浙江方志考(卷十一《温州府县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403.
- [12] [14] [17] [18] [19] (宋)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 1960:4401, 4271, 4217, 4318, 4297.
- [13] 赵树功.谢灵运《游名山志》辨名及佚文[J].文献, 2009(2):176.
- [15] [16] (北朝)贾思勰著.缪启愉, 缪桂龙, 译注.齐民要术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 [20] 章义和.关于南朝村的渊源问题[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69.
- [21] (南朝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4:205.